

毛泽东

与中国传统智慧

陆卫明 韩鹏杰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智慧

陆卫明 韩鹏杰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智慧 / 陆卫明, 韩鹏杰主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24-07028-9

I. 毛... II. ①陆... ②韩... III. ①毛泽东思想—文化理论—研究 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A841.67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937 号

书 名: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智慧

主 编: 陆卫明 韩鹏杰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10.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24-07028-9/A·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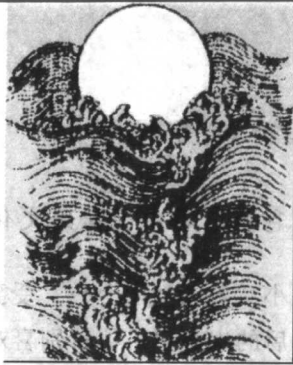
定 价: 17.00 元



目 录

绪论：传统智慧 源远流长	1
一 哲学精华 大本大源	15
(一) 湘学熏陶	16
(二) “内圣外王”	21
(三) 知行关系	35
(四) “中庸”之道	45
二 政治睿智 经天纬地	64
(一) 鉴古知今	65
(二) 政治哲学	73
(三) 治国方略	95
三 史家才识 博古通今	126
(一) 博览群史	126
(二) 史识独具	134
(三) 古为今用	149
四 文艺精粹 独领风骚	162
(一) 激扬文字	162
(二) 源头活水	166
(三) 推陈出新	195
五 经济学问 厚生利用	218

(一) 崇公抑私	219
(二) 重农思想	223
(三) 兼顾公平	233
(四) 崇俭戒奢	238
(五) 强本开源	247
(六) 统放结合	269
六 兵家纵横 决胜千里	282
(一) 熟读兵书	282
(二) 存亡之道	289
(三) 制胜韬略	292
结语：风流人物 谁与评说	315
后记	331



MAO ZEDONG YU ZHONGGUO CHUANTONG ZHIHUI

绪论：传统智慧 源远流长

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说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1]的确，作为一代巨人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成功与他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丰富的智慧营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为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正是由于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使他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藩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

（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毛泽东从小“熟读经书”^[2]，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特别喜欢研习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不涉及，直至晚年，在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里 9 万多册的藏书里，就包括着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典籍 850 册，2300 卷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勾画、眉批、点评、心得体会等，可见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酷爱之深。如何对待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何种态度，这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考察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切入口。

自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殖民入侵，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西方文化也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古老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强大挑战，它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随之发生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论争，这种论争在五四时期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文化论争过程中，出现了以旨在保全传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保守主义和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两种文化偏向。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亲身经历过这种文化冲突，他一方面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深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西方挑战下暴露出的危机与弊端。因此，他强烈地批判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认为它们分别是形式主义向左和向右发展。他说“‘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

是吃过大亏的。”^[3]另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4]这是因为：

首先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同样，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其两面性，它“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5]其次，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必然建立在对旧文化继承改造的基础之上。中国新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改造、重整以及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十分强调“不能割断历史”。此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继承民族文化的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个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国家何谈繁荣富强！因此，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就成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根本态度。对此，他作了多次阐述与强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

《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7〕

毛泽东多次阐述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决定着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和文化选择，在创造性地开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但是，问题是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的，要区分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创造性地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难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它不仅反映在显性的思想理论上，而且也深化到隐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习性等意识层面，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要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对此，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无法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比常人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毛泽东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某些论述所持的辩证的态度来论证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只有正面的而无任何负面影响的结论。这样就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无助与研究的深入。

（二）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往的中国学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过是“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只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兼学者——毛泽东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是毛泽东进行文化选择和改造的时代条件。广泛接触、大量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奠定了毛泽东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氛围中，“毛泽东的文化心态、个性品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想理论，无不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质的影响”。^{〔8〕}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在实践中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启迪。

首先，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毛泽东深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承继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和注重实践理性。”^{〔9〕}

儒家文化素来具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传统，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毛泽东的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恭敬敬地抄录了宋代大儒张载的一段著名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最醒目地体现了毛泽东所崇尚的历史使命感。他也欣赏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终生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意识基本上来自儒家传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与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情怀一脉相承。

实践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实、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主要特征，由来已久，最早以理论形态呈现在先秦的儒、道、法、墨诸家之学说中。实践理性尤其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思潮的影响。清兵入主中原后，从顾炎武到颜元，许多正统的儒家学者痛心于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的“清谈误国”，乃力倡“经世致用”之新风。这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回响，亡国灭种的危局呼唤着实学精神。这种精神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也体现得极为明显，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毛泽东就立下过“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誓言，并提出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10]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现象，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并因此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但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后来他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正是对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行中的积极效应。

其二，毛泽东十分重视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炼积极有益的成分，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哲学智慧到文学精粹，从政治谋略到革命策略，从军事战略战术到历史经验教训，应有尽有，因而造就了他独特的深深根植于中国古老大地的文韬武略。周恩来曾说：“读古书使他（指毛泽东）的知识更广更

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11〕}毛泽东的思想确乎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文化遗产。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有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批判性继承。毛泽东出色地运用了传统哲学的民族形式，汲取了它的某些合理内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主要是重视知行关系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颗耀眼的明珠。这“两论”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和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12〕}《实践论》正是扬弃了从孔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传统的知行观，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矛盾论》则是对中国丰富而古老的辩证法思想的革命改造。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突出表现在“尚变”意识中，毛泽东在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古代“尚变”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动、变、斗”哲学。

重民、保民、惠民的思想意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家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民本思想一直为一切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所推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毛泽东也毫不例外地重视民本思想。他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参见《新唐书·马周传》）的观点是十分赞同的。毛泽东的“人民观”反映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思维特点。他的群众路线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发挥。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政”，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来治民。毛泽东曾借用“施仁政”一词来说明民主的和说服教

育的方法，他强调要教育群众，教育人民。他非常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将其提高到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

中国传统文化宝库里既有《孙子兵法》、《管子》、《司马法》等军事名著，又有《东周列国志》、《资治通鉴》之类的记载大量战例的历史典籍，还有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早年曾广泛涉猎过这些思想资料。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这些军事思想。他的军事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大量引用了古代的军事理论和著名战例。正是由于毛泽东能从中国传统军事遗产中汲取精华，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形成了他的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军事思想。诸如：积极防御、集中兵力、避实击虚、机动灵活、力争主动等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导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话剧。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农业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崇尚农业的社会，与政治上民本思想相呼应的便是经济上的重农思想。“以农立国”一直是历代封建政权奉行不替的经济指导思想。传统重农思想认为没有农业就没有国家，就没有统治者的地位，农业是富国强民之本，所以统治者必须“爱民”、“利民”、“节用”。毛泽东一方面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养料，融会百家，推陈出新，形成了他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思想。毛泽东在革命之初就十分注重农村和农民问题，他认为没有农村的变革和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政治的巩固。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断言：“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3〕}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从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政权巩固的重要性上思考农业和农村问题。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4〕}他还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将农业放在首位。毛泽东深知中国农民的苦难，他强调关心照顾农民的利益和改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党夺取革命与建设胜利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独具雄风，成就非凡。他的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强调“文以载道”，文艺为封建统治服务。《礼记·王制》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说明文艺也具有下情上达的功能，王者可以通过文艺所表达的思想，一叶知秋，了解天下形势。另一方面中国文艺思想又抛开现实政治，主张抒发胸臆，吟咏情性，所以比较强调对“气”、“韵”、“意境”等的心领神会。毛泽东对这两方面都有吸收和创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内外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把文艺看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重要武器，他把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规定为文艺的第一要义，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特殊时期的这种做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收到了特别的效果。然而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文艺的这一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对后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毛泽东的诗词是我国传统艺术向现代化转化的光辉典范。由于他亲自驾驭了“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所以他的诗词题材新颖，意境高

阔，平添了一种吞吐宇宙的磅礴气势；加之其中贴切地运用过一些神话和典故，贯彻了他自己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使中国传统文艺形式恢复了活力，焕发出惊人的光彩。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全方位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与他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密不可分。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创造性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是主流。但是长期浸润在传统的思想与氛围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传统。这对晚年毛泽东有一定消极影响。“在反右斗争后，毛泽东曾如是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他还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清。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15]他早年曾追求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贤人格，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视人民群众为救国安邦的根本力量，但是，到了晚年他的家长制作风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滋生起来，并公开说个人崇拜需要有一点点。“他

期望通过自己的权威，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最有效地加强民主建设”，^[16]以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背离了民主和法制。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是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支柱，而《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对这一理想的最早记录。毛泽东早年曾有过按照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也有过“工读互助”的尝试和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他还经历了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毛泽东不是没有意识到平均主义的危害，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就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可是随着革命的胜利，那种具有传统色彩的成功经验被无限夸大了。

中国文化历来具有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传统。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历代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的价值，但另一方面毕竟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这对晚年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他对“一大二公”的提倡，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对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构想，以及对社会主义货币交换的不满等等。1958年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毛泽东甚至说道：“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17]他还从一千多年前农民起义的做法中**（即《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书）**·张鲁传》作了一些著名的批语和**（即《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书）**“吃饭不要钱，开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老传统。毛泽东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犯了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那**（即《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书）**群**（即《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书）**错误，从文化溯源上分析，“就是中国传

统因素对他的影响逐步加强，特别是在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构想中。”〔18〕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精湛造诣从积极方面看，就是他能更好地立足于传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消极方面看，他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在他的知识结构中，明显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他对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管理也知之不多。他身上也有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19〕到了晚年，传统文化甚至成了他身上一个沉重的负担。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极为复杂，不仅仅是继承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成于斯，而又败于斯”，他们之间是双向互动的。作为一个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文化巨人——毛泽东，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施加影响之前，传统文化早已在他身上打上了烙印，他对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传统文化对他的反作用，相互较量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合力。

然而，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更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舵手，我们应当把研究重点放在他是如何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上，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使古今接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那么，我们从已逝的伟人身上借鉴经验教训，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薄一波曾讲到“毛主席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20〕“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那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继往开来，为完成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伟